

# 苏轼黄州词作与水性思维

韩玺吾

(长江大学 期刊社,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 谪居黄州的五年为苏轼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苏轼作于此期的词与其诗文一道成为其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苏轼黄州词作中意象虽极为繁富,但贯穿其始终的水意象无疑可为其主体意象。苏轼黄州词作中的水意象分明呈现出一条由凄丽而至平和,再由平和而转旷达的演变路径。而其演变之因,既与苏轼善于排解忧愁,随遇而安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与其在遭贬黄州的特定背景下,经由楚天之雨楚地之水的熏染而生发的水性思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水性思维在助推苏轼思想转型的同时,促成了苏轼人生观的形成。

**关键词:** 苏轼;黄州词作;水意象;水性思维

**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2017)05-0015-03

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乃苏轼人生之一大转折。自此为始,苏轼的人生追求,开始由早期的“奋厉有当世志”<sup>[1](P1117)</sup>,而转向悠游于三教之中,以自我超越为的。其可具体表述为:在对“人生如梦”的真切反思中,发明自性,师范渊明。因其“人生如梦”的直接表述,见之于其黄州词作之中,故考察其黄州词作,当可从中窥见其思想转型之轨迹。有关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思想转型之因,论者虽多,但较少从楚文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一途展开讨论,因此,笔者拟从苏轼黄州词作入手,考察楚文化之水性思维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以从另一层面窥视其贬谪黄州期间思想转型之因。

王文诰《苏轼诗集》云:“先生以元丰二年,自湖州守得罪,为黄州团练副使。明年二月至黄州。”<sup>[2](P1031)</sup>苏轼《子姑神记》云:“元丰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师来黄州。二月朔至郡。”<sup>[3](P406)</sup>据此,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认为:“苏轼坐乌台诗案贬黄州,于元丰三年庚申二月一日到黄州贬所。”<sup>[4](P296)</sup>以此为据,笔者将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七年(1084)苏轼作于黄州的所有词,视为其黄州

词作。据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黄州词作共计77首。本文即以上述词作中所涉及的水意象为中心,讨论水性思维对苏轼以自我超越为的之人生追求所产生的影响。

身遭大劫,初到黄州贬所的苏轼,既有回首旧事,恍若一梦的心绪黯淡的一面;亦有大劫已过,冰冷的心情渐趋复苏的一面。这些细微的心理变化,都借助于其黄州词作中的水意象,巧妙地呈现了出来,如其《南歌子·感旧》。此词为苏轼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二月,作于黄州”<sup>[4](P287)</sup>。有关此词之意,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剖析甚为分明,现钞录于此:“词中先化用韩愈、白居易诗句,言‘寸恨’虽短,尚且难裁,自己受污,系狱,遭贬,此恨‘绵绵’,裁更不易。回想去年(己未)七月被捕,年底获释,到今岁(庚申)正月贬来黄州,‘半年’多来,爱妾闰之为我忧心忡忡,‘眉绿’未开。而今诗案‘旧’事总算过去,(故词题曰‘感旧’),恰如‘残冻’因‘春雨’降而‘消融’,已‘冷’若死‘灰’的心情也因‘温风到’而复苏。人生如梦,为欢几何,还是好自为之,‘尊前’更‘留取曲终一拍’,究‘为谁哉’?乃以‘待君(指闰之)来’黄州相聚也。”<sup>[4](P287)</sup>此词换头“春雨消残冻”一句,将上述情思融于暖酥纷飞的春雨之

收稿日期:2017-07-05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1jyte002)

作者简介:韩玺吾(1965-),男,湖南华容人,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复使其飘洒于辽阔复远的楚天之下,便自带有一种虽缠绵不已,却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

在一段时期内,这样一种因“受污,系狱,遭贬”而生发的感伤,劫后余生的侥幸,以及随遇而安的旷达,诸般复杂情怀,一直萦绕于苏轼心头,形之于笔端,便有了其词中姿态万千的水意象,如其《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此词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春作于黄州,以水意象为主体意象,将万千情怀打入一片江水之中。词以“晚景”领起,语兼双关,既指眼前傍晚之景,又暗指年岁向晚;但此时作者年仅46岁,正当盛年而生晚景之叹,既可见其历经乌台诗案后心情的颓丧,亦流露出其人生追求转向的端倪:既已老迈,“奋厉有当世志”<sup>[1](P1117)</sup>的少年之气便渐趋消泯,而代之以泰然平和的归欤之叹了。于是,这便有了“认得岷峨春雪浪”之句。苏轼《东坡志林》尝云:“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sup>[5](P79)</sup>如此一来,眼前的江水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既是怀归之情的切实载体,又是以之浇自己块垒的鲜活载体。因此,即便黄州附近的山峦上依旧昏暗,但一阵“暮雨”将山峦淋湿后,山色已然渐趋明亮,更兼“东风”“卷地”,将“暮雨”吹散,沉沉的楚江便初步呈现出了开阔的气象。虽然此际仍只有“落照”,“江天”也只“一半开”,但阴霾既已渐渐散去,江天一色的景象自必终将到来。细味此词之意,不难见出乌台诗案后苏轼细微的内心活动,以及其自我开解,渐趋旷达的心路历程。类似的心绪,在其此后的黄州词作中得到了一再展现,且都是凭借水意象呈现出来的。其或伤感,如“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sup>[4](P293)</sup>、“忧愁风雨”<sup>[4](P458)</sup>;或放达,如“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sup>[4](P295)</sup>;或自我开解,如“二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sup>[4](P471)</sup>、“照水红蕖细细香。……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sup>[4](P474)</sup>;或萧然生出尘之念,如“萧萧暮雨人归去”<sup>[4](P464)</sup>、“江海寄余生”<sup>[4](P467)</sup>,不一而足。凡此诸般思想,既是他善于排解忧愁,随遇而安的性格的自然显现,“更与他后来写的赤壁词、赤壁赋等黄州诸作一脉相承”<sup>[4](P287)</sup>。

## 二

如果说,乌台诗案后到黄州贬所的苏轼,其内心复杂的情思,经由楚江楚雨的熏染,显得灵动而细微的话;那么,磅礴奔涌的楚江,夭矫多姿的楚水,更在

涤除其内心潜藏的感伤的同时,拓展其心胸,愈益张扬了其雄放杰出之势。这既因苏轼与长江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蜀地风物虽然不同于楚地,“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sup>[6](P62)</sup>,但有一点则是与楚地相同的,那便是江水,不仅“江汉西来……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sup>[4](P335)</sup>,且在苏轼眼中,这条江水是可以直接看作“我家江水”<sup>[6](P307)</sup>的;更因江水出峡后,即似挣脱羁绊的巨龙,夭矫灵动,奔腾于辽阔的楚天之下,与苏轼天性中不羁的野性两相凑泊,相得益彰。如此一来,水意象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轼黄州词中藉以彰显其内心幽微之情的主体意象。

如上所述,初到黄州贬所时,苏轼黄州词作中的水意象虽已微露旷达之姿,但大体以感伤为主。换言之,乌台诗案在苏轼内心所遗留下的阴影,在一段时期内,一直萦绕于苏轼心头,挥之难去。旧事不堪回首,却又每每不自禁地回首,尤其在身处僻远的黄州之后,这种矛盾心情,便一直缠绕在苏轼心头;但随着时日的流逝,苏轼天性中随遇而安的一面,便渐渐在楚江楚水的激荡之下,渐趋显露,隐隐然开始驱逐其感伤的一面,而渐趋旷达爽朗。其《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一词,便是这一转变的显豁标志。此词前有较长的小序,详尽地记叙了词作之缘起:“闾丘大夫孝终公显,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胜绝。元丰五年,余谪居于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觉而异之,乃作此词。公显时已致仕,在苏州。”<sup>[4](P349)</sup>由此可见,这是一首记梦之词,梦中人物则为前黄州太守闾丘孝终。苏轼贬黄州前,已与闾丘孝终有交。其于熙宁十年丁亥(1077)八月作于徐州的《浣溪沙》(一别姑苏已四年),即为其过徐州时赠闾丘孝终之作。此词虽为梦中怀友之作,但全词所贯穿的仍是词人一己之情怀,所彰显的仍是词人之自我人格。词“上阙全写梦境”<sup>[4](P352)</sup>,以“小舟横截春江”领起,寄情于一江春水,既曰“横截”,不羁之志已在目前,复曰“卧看”,潇洒之姿宛然如画。从中可见出词人此际的心态,即欲以洒脱不羁之情,应对现实中的种种困厄。“笑语”“高会”“艳歌”,旧事历历,何其畅怀,似从“云间”洒落,纷纷扬扬,不由人不去怀想;但意兴勃发之际,诸般旧事却“绕云萦水”,坠入大江之中,渺然难觅踪迹,只余下词人“独回首、烟波里”,“空灵中杂以凄丽”<sup>[4](P352)</sup>。词以江水云烟收结上片,怅惘之情,迷茫之意,尽在其中。换头接续前意,却于“惘然”之中,托出千里明月映照之下的一条“空江”,“故人”已归“五湖”,我则独留“云梦南

州”，是谓旧日欢会成空；但“月明千里”，既可长寄相思，亦可扫除眼前“烟波”，一空我心，且春水“多情”，不离“故人”与我之左右，“梦里”“参差”可见，又何必一意“惘然”哉！至此，词人终于找到了得以走出乌台诗案遗留下的阴影，摆脱笼罩于心头的残存的凄丽之情的路径：以梦为桥梁，以水为依凭，以自适为准绳，复归自性。其随后所作的《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便是这一路径的形象表述。此词前面照例有一小序，详尽地记叙了词作之缘起：“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sup>[4](P352-353)</sup> 此词于“元丰五年壬戌(1082)二月，作于黄州”<sup>[4](P353)</sup>。词以“梦中了了醉中醒”领起，以酒为媒介，既将现实与梦境勾连在一起，且“能在梦而了，在醉而醒”<sup>[4](P355)</sup>。接下来，词指明梦中依归乃是师范渊明，躬耕东坡，复以“春雨”“暗泉”“小溪”等水意象，穿插于梦境与现实之间，将其欣然之意，幽微之情，自适之貌，层层托出，使其收结于“吾老矣，寄余龄”一句之中，语虽无奈，却不乏飘逸洒脱之气。自此为始，灵动飘忽的楚天之雨，千姿百态的楚地之水，不仅成为苏轼黄州词作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更在抚慰苏轼心灵，涵养其性灵的同时，使其逐渐领悟到了人生真谛。其或“吟啸”“徐行”于“穿林打叶”的“一蓑烟雨”之中，因而生发出“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sup>[4](P356)</sup>之感；或在“萧萧暮雨”中，游蕲水清泉寺，面兰溪，而悟得“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sup>[4](P358)</sup>之人生秘奥；或在“瀰瀰浅浪”“一溪明月”中，“解鞍欹枕”“醉眠芳草”，而生发“不谓人世”<sup>[4](P361)</sup>的出尘之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sup>[4](P364)</sup>，“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sup>[4](P367)</sup>，在苏轼眼中，这飘忽而至倏然而去的楚天之雨，不仅是其人生困厄的形象写照，亦且是其悟道的良媒；惟其如此，其才有“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sup>[4](P368)</sup>之不羁之举，且油然生发出“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sup>[4](P368)</sup>之轻快自得之感。至此，因乌台诗案而笼罩于苏轼心头的阴云，终被楚天风雨所

吹散。在楚天之雨楚地之水与庄周之梦的混成之中，苏轼终于完成了由早期的“奋厉有当世志”，转向悠游于三教之中，以自我超越为旨趣的思想转型；而这一成功转型的标志，自然便是苏轼黄州词作中《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横空出世。换言之，此词的问世，标志着苏轼由早期的“奋厉有当世志”，而转向于悠游三教之中，以自我超越为的之人生追求思想的最终定型。

随着这一思想的最终定型，词人顺利地完成了其自苏轼向苏东坡的华丽转型；而这一华丽转型的最终得以实现，既与苏轼善于排解忧愁，随遇而安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与其在遭贬黄州的特定背景下，经由楚天之雨楚地之水的熏染而生发的水性思维，有着紧密的关联。“水性的圆转通变、阴柔卑下、丰赡华美、汪洋恣肆，不仅会孕育深刻的哲理之思，亦且会涵养文学的独有品性。”<sup>[7]</sup>得益于此，苏轼的黄州词作，便在一派水汽氤氲中，汇洒脱与飘逸于一炉，融灵性与哲理为一体，汪洋恣肆，无所不可。苏轼《自评文》尝有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sup>[8](P2069)</sup>这段话虽是针对其文而言，然移之于其词未尝不可。以之反观苏轼黄州词作，我们当可发现，其词不仅行文如水，亦且情思如水。一言以蔽之，于苏轼黄州词作及藉此彰显出的其人生追求之形成而言，水性思维厥功至伟。

#### 参考文献：

- [1] 苏辙. 苏辙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2] 王文诰. 苏轼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 邹同庆, 王宗堂. 苏轼词编年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5] 苏轼. 东坡志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6] 王文诰. 苏轼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 韩玺吾. 水性思维: 楚文化之主体特征[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 [8]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责任编辑 周家洪 E-mail: zhoujiahong2004@163.com